

# 气候峰会难以抵达的正义

文 | 陶恺

13年过去了,发达国家每年共同调动“1000亿美元”的承诺从未兑现。



2022年11月20日,埃及沙姆沙伊赫,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闭幕式

11月中下旬的国际社会,有两个“战场”备受瞩目:一边是11月21日世界杯赛事在卡塔尔打响,一边是11月6日到1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气候与足球,会议与比赛,似乎本不该相提并论,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过往“踢皮球盛况”略知一二的人,将对这个联系会心一笑:与会国对于气候、环境、经济的议题彼此推诿,就像足球比赛一般布控防线,计算着承诺、付出与收益的正负。

在本次气候大会的“脱碳日”,来自小国巴巴多斯的联合

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哈特提出:淘汰化石燃料势在必行,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援助以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事实上,关于发达国家是否弥补、如何赔偿气候损害的博弈,已纠缠多年。

## “至暗时刻”

从1995年起,连续27年,气候大会都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轮换举行,今年也不例外。与世界杯临近的这场气

候大会,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每年的例牌,议题或效果可能都不算新奇。

但在世界经历了政治、军事、卫生、环境等多重震荡之后,今年的气候大会忽然变得存在感突出,两周的交流与谈判也吸引了多方眼球。例牌变成了特别,让气候大会承载了诸多期待。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从年头到年尾,无论是非洲之角面对的40年来最严重干旱、美国西部1200年以来的最罕见干旱、澳大利亚多达四次的洪水危机,还是欧洲被致命热浪舔舐,极端气候总是如影随形,让世人很难无动于衷。

新冠疫情带来的持续经济下行,让人类走向清洁能源、寻求气候保护生产方案的脚步慢了下来;俄乌冲突短期内依旧看不到结束的表征,因这场冲突而起的能源战,更让依赖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走入了能源窘境,原本承诺的能源转型、气候友好一类的展望,在生存面前变得不值一提。

无论是大国与大国、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任何一种排列组合内的彼此信任与合作,都在大环境的冲突、小切口的反复中消耗殆尽。

气候问题从不只关乎温度与天气,也不仅仅是讨论单纯的环境问题。气候大会始终是一块绿茵场,上演着各国政治博弈的赛事,但今年,在天气、疫情、冲突的多面夹击下,国际社会或许都到了必须向气候大会倾注目光的“至暗时刻”。

## 消失的1000亿美元

对于声量极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欧洲发达国家在冲动地对俄能源制裁后感受到的酷热或严寒,

气候大会始终是一块绿茵场,上演着各国政治博弈的赛事。/



索马里人、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亲善大使萨布丽娜·艾尔巴

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慨,已经是一种“凡尔赛”式的喟叹了。对于来自巴巴多斯、乍得、索马里,甚至主席国埃及这样的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带来的“至暗时刻”早就开始了。

在这次与会环保主义者的表态里,我们能看到那些聚光灯外的小国,正在忍受怎样的气候危机。

来自乍得的一名环保主义者说,在乍得,许多人因洪水、干旱而死亡,一些生活在太平洋地区的人们,更是因为海平面上升流离失所。对于她和她的家园而言,气候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眼前生命的陨落、无家可归的彷徨,更是对未来的绝望。

索马里人、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亲善大使萨布丽娜·艾尔巴也在一场记者会上,描述了本国面对的气候危机:连续4个没有雨的雨季,让索马里陷入了40年来从未有过的、颗粒无收的窘迫。由于工作身份,她比一般的环保主义者想得更远:包括索马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只能独自面对恶劣气候的侵袭,势必产生更多牵涉粮食安全、贫困、流民、犯罪的问题。

这些针对发达国家、展露伤疤般的敦促,是希望追讨一项早在13年前便确定下来的“赔偿金”:



13 年前的第 1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做出了承诺：到 2020 年，每年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帮助其使用新的技术手段适应气候变化，并通过这种“赔偿”方式“反求诸己”，最终达到节能减排、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苗头的目标。

但显然，13 年过去了，每年共同调动“1000 亿美元”的承诺从未兑现，发达国家依然坐享属于自己的财富，只留下发展中国家在金钱、技术的困顿中独自打转。

### 赔偿还是共促？

埃及政府自确定成为第 27 届气候大会的“东道主”以来，便期待一场“真正的非洲会议”，为发展中国家谋取福利，充分探讨损失与侵害，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再次坐下来

## 发达国家确实坐在了谈判的圆桌上,但表态极为含糊。 /

充分谈“赔偿”。

今年谈判开始的第一天，与会代表就达成了一致：可以再次讨论富裕国家是否应该给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穷国家补偿——能够被提上官方议程，已然是重要的一步。与会环保主义者甚至有了更多乐观的期待：新冠疫情、局部冲突是否软化了发达国家面对世界的态度？既然“全球流行”的新冠可以让各发达国家毫不吝惜地掏出数万亿美元用于医疗、提振经济，那这一次，“同此凉热”的气候问题，不也正是需要共同面对的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消失的 1000 亿美元”一般难以兑现的伪承诺，还是开始浮现。

发达国家确实坐在了谈判的圆桌上，但表态极为含糊。专注选举的美国总统拜登，一面陈述着美国作为大国定然会履行职责，一面拓展油气开采，声称是俄乌冲突临时背景下“不得不”的选择。欧洲国家更是以“国内有更紧迫的事务”为由，在谈判中如同隐形——欧洲一直是推进气候举措的“优等生”，但天然气的匮乏让它原形毕露。

主席国埃及为这次大会推出的口号是“一起为落实”。埃及呼吁各国脚踏实地、兑现既有承诺，也不断转换语气，希望将“赔偿”修正为“共同促进”，扭转过往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固有关系，让世界回归共同面对的对话氛围。

但汹涌的气候恶化浪潮，可能等不及见到 1000 亿美元、等不及人类慢慢梳理语言、从战争与疾病中找出头绪了。

今年，巴基斯坦发生了罕见大水，巴基斯坦外长这样形容这场“天灾”：“今天，3300 万巴基斯坦人正在以他们的生命和生计为大国工业化‘埋单’。”他呼吁，要求那 1000 亿美元落实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不是要伸手向发达国家要慈善、要施舍、要援助，而是要“正义”。

这次，正义，会来吗？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



波黑萨拉热窝城郊

## 伤痕之城“萨拉热窝”

文图 | 张侃

遍布全城的200处“伤疤”——被称为“萨拉热窝玫瑰”的鲜红色印记，几乎每一处都意味着曾有无辜的平民在那里丧生。

我在萨拉热窝时，住在城郊山上的一幢民宿。从外地开车去那，并没有经过萨拉热窝市中心。因而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便如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个著名的空镜头：

向下俯瞰，夹在苍翠群山中的红屋顶鳞次栉比。洁净的白墙与艳丽的红瓦相映成趣，奠定了整幅画面温柔的基调。各清真寺林立的尖塔穿插其中，构成它坚韧的骨架。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下山朝城市方向走去，一路都是狭窄而陡峭的坡道。

道路两侧高耸着欧洲 19 世纪风格的建筑，分外压抑。屋檐下那些繁复的花饰犹在，可周遭的墙体却早已泛黄斑驳脱落，宛若耄耋老者褶皱的皮肤。

直到我走下山坡，来到谷底的米里雅茨河边，整座城市的活力与魅力才猛然显现出来。人流熙攘的街道，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有轨电车穿梭其间，处处透着老派欧洲的靡丽。而只相距一个街口之外的巴西查尔西亚老城，景色却立刻转为欧洲十分罕有的西亚风情——这里是萨拉热窝最古老的城区。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萨拉热窝如今这番独特风貌



2022年巴基斯坦洪灾







也绝非一日之功。如今萨拉热窝人的祖先斯拉夫人，在公元7世纪来到这里，取代了在此定居超过200年的伊里利亚人。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西巴尔干。在此后的400多年中，萨拉热窝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北边陲。征服者将土耳其语的“宫殿”与斯拉夫语表示地名的结尾“evo”结合，将这里称为“萨拉热窝”，即宫殿之城。

直至19世纪，老迈的奥斯曼帝国日渐式微，北方虎视眈眈的奥匈帝国在1878年占领了波黑。他们将萨拉热窝作为城市发展的试验场，一座座欧式建筑紧挨老城拔地而起，而作为最新事物的有轨电车也于1885年在此开始运营，比作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运营它早上12年。

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波黑）并入自己的领土，一直将波黑人当作自己同胞的邻居塞尔维亚被激怒了。他们梦想着将整个西巴尔干地区都纳入“大塞尔维亚”的版图。

1914年，奥匈帝国储君，也是帝国陆军司令的斐迪南大公，携妻前往波黑视察军事演习，之后又来到萨拉热窝访问。他不曾预料的是，早已有一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等

待着他。

6名刺客拿着手榴弹与手枪，埋伏在他进城车队必经的路线上。前两名刺客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攻击，第三名刺客才找准机会扔出手榴弹。手榴弹落在车后爆炸，炸伤了几名随从和一些围观群众，大公夫妇奇迹般毫发无损。车队加速前进，使得埋伏在前方的另外三名刺客同样没能发动攻击。

大公按原计划到达市政厅，照常参加了欢迎典礼。之后，他决定去医院探望因爆炸受伤的人员，然而他的随从却忘记了通知司机。司机继续原定的路线返回：在拉丁桥没有左转过河，而是右转，准备向市区驶去。当他们发现这个错误，才停下车来想要倒车返回。这时，刺客之一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刚好就在旁边。他飞快跳上车子踏板，朝大公夫妇连开两枪，结束了两人的生命。震惊世界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了。

一个月后，奥匈帝国正式对塞尔维亚王国宣战，而各自站在两国身后的德意志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以及俄国的盟国法国与英国，也相继宣布加入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本就风雨飘摇的旧欧洲再无宁日。



### 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18年一战结束，战败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而它辖下斯拉夫人的土地，即现在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大部分区域，则被统治塞尔维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吞并，南斯拉夫王国由此成立。

二战时，萨拉热窝一度被纳粹德国占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故事即源自这段岁月。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长期担任领导者的克罗地亚人铁托成功压制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野心。近半世纪的时光里，不同民族的南斯拉夫人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1984年，萨拉热窝近乎完美地举办了冬奥会。

在那时，民族间不和谐种子其实已悄然埋下。

上图：  
萨拉热窝的有轨电车

左图：  
1984年冬奥会在萨拉热窝举行，图为冬奥会纪念标志

有轨电车也于1885年在此开始运营，比作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运营它早上12年。

1980年铁托去世，联邦的根基开始松动。与主要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另外三个加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马其顿不同，波黑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族与克罗地亚族几乎是三分天下之势。因而，几乎可以预料地，一场由三个民族及其各自后台支持的内战会在波黑爆发。

1992年4月6日是独立后的波黑获得国际承认的日子。然而就在同一天，代表塞族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炮击萨拉热窝。塞族军队与民兵迅速包围了城市，切断了城中的水电供应与离开城市的所有通道。

30多万萨拉热窝市民，沦为了生死未卜的笼中之鸟。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每日前往米里雅茨河畔排队取水，或是前往黑市高价购买赖以生存的食物。然而，城中暗藏的狙击手，让他们的每次出门都变成一场冒险。城市的主干道“波斯尼亚之龙”街成了臭名昭著的“狙击手巷”，不明身份的狙击手埋伏





左图：  
公园里的“牛肉  
罐头雕塑”

右图：  
弗尔巴尼亚桥  
上，竖着一尊  
“萨拉热窝的  
罗密欧与朱丽  
叶”纪念碑



在两侧的高楼中，向着那些试图穿越街道的平民开火。那些不得不穿过街道的人，只能冒险穿过枪林弹雨，或是躲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装甲车后通过。前后有 200 多人死于这条“死亡之巷”，另外 1000 多人因此受伤。

关于这期间平民的生活，没什么比公园里那尊“牛肉罐头雕塑”更真实也更讽刺的了。市民的大多数食品与药物都来自欧美飞机空投，其中最多的便是肉罐头。雕塑的基座上写着“感激的萨拉热窝市民向国际社会致敬”。然而事实却像是一则黑色幽默：尽管雕塑是一盒牛肉罐头，但真实的罐头中很多都含有猪肉。对一座穆斯林占多数的城市，这近乎一种羞辱。而很多罐头甚至是来自美国越战期间的库存，已存放了 20 余年，味道可想而知。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连街头的流浪狗都拒绝食用那些罐头。

与其说这是一场塞族与穆斯林间的战争，倒不如说这是一场狂热民族主义者与渴望和平的平民间的较量。向平民开火的不只有塞族军队，而被困在城中的也不只有穆斯林。

1993 年，塞族男青年 Boško Brkić 与穆斯林

女青年 Admira Ismić，这对萨拉热窝情侣，决定携手逃出重重包围下的城市。他们在 5 月 19 日下午 5 时到达横跨米里雅茨河的弗尔巴尼亚桥，对面即是包围圈外由塞族控制的区域。两人事先已借助各自的关系，与交战双方商定好，在他们逃离时暂时停火。然而就在他们过桥时，不明来源的枪声响起，两人应声倒地。男生当场死亡，女生挣扎着爬向男友，两人最终相拥在一起，凝固在时光之中。凄惨的画面被路透社记者拍下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他们两人被称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走在如今的弗尔巴尼亚桥上，往来行人穿梭不绝，一切关于战争的阴影似乎早已消散。但就在桥中心，竖着一尊纪念碑，纪念 1992 年在这桥上被射杀的两名反战示威者：女大学生索达·蒂波热维奇，与两个孩子的妈妈奥尔加·索切奇。在北侧桥头，经历过战火的建筑（仍有人居住）外墙仍保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坑，让人不寒而栗。

／ 市民的大多数食品与药物都来自欧美飞机空投，其中最多的便是肉罐头。 ／

在萨拉热窝城中各处，还能不时在地面见到那些被称为“萨拉热窝玫瑰”的鲜红色印记。它们被涂在混凝土地面的凹陷处。那些不规则的喷溅形状，宛如一块块血淋淋的伤疤。凹陷并非刻意做出的，而是源自围城时迫击炮弹的爆炸。遍布全城的 200 处“伤疤”，几乎每一处都意味着曾有无辜的平民在那里丧生。

### “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关于萨拉热窝经历的围城，没有哪里比穿越萨拉热窝机场跑道的那条隧道更令人震撼的了。

那时，塞族军队将整座城市合围，只在机场处留出了一道缝隙。在那里，被围困的萨拉热窝城，与外界波黑政府军控制的区域，只相隔了一条机场跑道。然而作为联合国特派部队的驻地，机场是当时的中立区域，双方都无法进入。于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就此开始：自 1993 年 3 月起，萨拉热窝内外的军民，靠着简陋的工具，花费整整四个月时间，挖出了一条全长超过 800 米（其中 340 米位于机场跑道下）的隧道。被重重包围一年多的萨拉热窝，终于不再是一座孤岛。

如今隧道的北侧出口，即通向萨拉热窝市内的那一侧，已被辟为展示这段特殊历史的博物馆，甚至保留了一小段隧

道供参观者体验。我钻进那条仅有 0.8 米宽、1.6 米高，用简陋的木条作支撑的逼仄隧道，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感立刻袭来。只向前走了几米，我就立刻退了出来。

然而在围城期间的萨拉热窝，每天都有数千人，花费 2 个小时，蜷着身子排队从隧道中穿过。他们要么是渴望逃离战场的平民，要么是被派往城中支援的战士。由于隧道没有通风系统，其中的空气永远污浊而恶臭；而由于不断渗出的地下水，穿越者需要蹚过的积水更是常有齐腰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萨拉热窝市民赖以生存的物资，从汽油到香烟，靠着手推车源源不断运入城中。如果没有这条“生命隧道”，我想，萨拉热窝的围城一定不会以人民的胜利告终。

1996 年的《代顿协议》终结了波黑内战，也让持续近四年的萨拉热窝围城得以告终。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一次围城过后，波黑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它却被划分为两个互不隶属的实体：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为主的波黑联邦，与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间的边界犬牙交错，大多都源自内战结束时实际控制的领土。因而在距离隧道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便是属于塞族共和国的区域了。

我开车穿过地图上的边界，道路两侧没有任何标志物，但这条“看不见的线”，却区隔着萨拉热窝不同民族的居民。战前，他们比邻而居在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甚至一些人还在内战中并肩作战过。然而在近 30 年后，三个民族之间的猜忌与仇恨仍未消弭。尽管任何波黑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居住地，但塞族居民还是几乎都迁往塞族共和国所在的区域，而塞族共和国境内的穆斯林族也大都迁走。

在波黑的版图上，萨拉热窝几乎是稳坐在它的中心。然而若从两个实体的边界看，萨拉热窝却可算是“前沿中的前沿”。那条人为划出的边界线，就像一条绵延上千公里的伤疤，横亘在波黑饱经沧桑的土地上。

“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这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末尾出现的经典台词，在这座城市经历过更多的苦难与伤痛之后，无疑获得了更深刻的含义。 ▮